簡介BBC的三本暢銷書（上）

郭正昭

K. Clark, *Civilization—A Personal View*
J. Bronowski, *The Ascent of Man*
J. K. Galbraith, *The Age of Uncertainty*

(一)

從一九六九年以來，歐美文化界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主導下，推展出一系列備受矚目，構思新穎的節目計劃。每一計劃即邀約一位當代名家，就其精研的範疇，透視並剖析時代的危機，而追溯其歷史根源，並闡述文化發展的未來動向和展望。每一計劃包括十三套影集，由主持者現身說法，夾敍夾議，娓娓道來。以眞實的背景，提供生動而深刻的歷史評論，令人神往，發思古之幽情。講稿經整理修訂，附錄圖片，印製成册，便成了近年來轟傳世界的名著和暢銷書了。目前實現的計劃已有三種，即克拉克（K. Clark）的「文明——個人的觀點」（*Civilization: A Personal View by Kenneth Clark*）

，布魯諾斯基（J. Bronowski）的「人類的躍昇」（*The Ascent of Man*），以及葛爾布萊茲（J. K. Galbraith）的「不確定的時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分別從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角度，探討人類文明的變遷。著者在上述三書中所分別闡揚的見解，所傳達的靈契，顯然有力地銜接了現代西方人的危機意識——包括所有文明困境所帶來的精神苦悶和空疏。這是上述三書及據以拍攝的影集，所以廣受社會一般讀者觀衆熱烈歡迎而歷久不衰的心理背景和內在潛因。BBC 慧眼獨具，膽識過人，這項富於創意的投資，誠如顏元叔教授所說，乃是「大衆傳播從事高水準文化工作的空前創舉。」

筆者研習科技文明史，向持人道的樂觀主義，但這些年旅居美國的親歷見聞，却不得不對當代某些社會文化畸形發展的徵兆，懷抱深潛的隱憂。因此擬藉上述三書的簡約評述，透露當代西方危機論的一點消息和線索。居今之世，即使生活在海島樂園的人，也不可能自外於當代文明變遷思潮的籠罩，何況上述三書所探討和發掘的，乃是人類共同而迫切的課題，對這一思潮的冲擊，我們又豈能故做羲皇上人狀，冷漠而無所感動呢？這裏且按出版順序，先從克拉克的「文明」一書談起。

(一)

克拉克氏是一個聲名揚溢的藝術評論家兼歷史家，顯然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基於他的超唯物的精神信仰，他深信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倘若對自己懷有堅定的自尊的信念，倘若能在精神基礎上自我肯定，便會創造燦爛的文明。這一信念幾乎支配並貫穿了他的文明史觀。從「浩刼餘生」（The Skin of our Teeth）篇，他描述古希臘羅馬文明衰落的歷程，其眞象並非完全肇因於野蠻的日耳曼的暴力侵略，而是基於相應的內心狀態——「恐懼」（fear）。恐懼戰爭，恐懼侵略，恐懼瘟疫和饑荒，遂使人覺得建築房舍、植樹、播種，都是多餘而不值得做的事，因此恐懼乃成爲文明的大敵。

文明不是永生的，看西方人的豐功偉業，推想西方人在哲學、科學、法律，文藝等方面的傑出成就，人們不會相信歐洲文明有毀滅的危機。其實這種嚴重毀滅的事實，在日耳曼蠻族以暴力橫掃羅馬帶國時，已經歷過了。當時文明所指稱的一切人類活動，都在

西歐歸於死寂，歐洲文明的脈動停息達兩世紀之久，因此歐洲今日的文明可說是「浩刼餘生」。西方人近年來感染一種普遍的焦慮，卽恐懼這種文明毀滅的歷史重演，因此克氏認爲當今是重溫史實的適切時機。從文明發展的整個過程看來，我們相信人類畢竟是有智力，有創造力，有秩序感，有悲憫心的一種動物，透過宗教信仰的啓廸教化，文明復甦，人類的脚步跨入了所謂「大解凍」（The Great Thaw）的時代。天主教會的力量普及全歐洲，變成知識與藝術的保存者與開拓者。因爲天主教會無分國族畛域的國際性，打破貧寒微賤階級的民主性，以及超越而入世的世俗性等三種因素特徵的滙合，乃能網羅當時歐洲的才智之士。亞伯拉（Peter Abelard）以他才氣縱橫的思想和雄辯，倡導兩個認知的態度：「我必須了解以期信仰」（I must understand in order that I may believe）；「懷疑導致問難，問難導致眞理」（By doubting we come to questioning, and by questioning we perceive the truth.）這是創造知識與文明的內在動力。

中古文明最顯著的藝術表現是哥德式的建築風格。這種風格，使人油然產生輕靈乃至飛騰的意識感受，象徵了人們從塵世朝拜天堂的精神趨向。同時像教會大方丈蘇傑（Suger）神父這樣地位尊崇的人，居然自我貶降到一般手持泥刀的工匠，從事大規模而繁複的建築與雕刻，使人間處處聳立了雄偉壯觀的物質成就，這便需要進一步從宗教信仰去肯定其精神價值了。於是蘇傑的劃時代名言：「遲鈍的心靈經由物質而及於眞理」（The dull mind rises to truth through that which is material.），遂成了中世紀文明重建的一個革命性觀念。這一觀念所衍化的信仰，乃是其後百年間藝術巨構的文化背景，並垂爲當代藝術信仰的基礎。

㈢

從十三、十四世紀的所謂哥德式（the Gothic）時代，到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克氏嵌在宗教信仰的主題，繼續闡釋物質環境裏精神文明的新動向，分別說明了「浪漫與現實」（Romance and Reality）的思潮。他描寫中古世紀騎士柏拉圖式的愛，如何融入聖母崇拜的信仰，而强化了宗教的愛。這樣尊重乃至崇拜女性，乃是文明發展的起點。聖方濟（St.

Francis）神父，把騎士精神應用在窮苦人身上，他拋棄榮華富貴，過苦行僧生活，專爲窮苦的人服務。而十四世紀的佛羅倫斯已是歐洲的商業重鎮，商人崛興國際性金融體系萌芽。在這個商業繁榮的社會裏，同時誕生了兩個偉人：一位是寫實主義的畫家喬陶（Giotto），以及一位中古神權社會與神權體系的代言人——但丁（Dante），他寫下中古基督教最偉大的詩篇：「神曲」。克氏說：「喬陶屬於銀行家及商人的實事求是的現實世界，但丁則屬於哥德式與偉大教堂的超越世界。但就中古社會的整體趨向而言，還是一個基督教規畫與條理化的世界，也就是「神曲」的世界。

這個基本趨向，要到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才有了重大的改變。因爲文藝復興運動淵源於希臘的「人本主義」（humanism），其基本精神卽是以人爲本，以人爲中心，是反對「神本主義」（theocentricism）的。文藝復興傳衍至現在有兩個觀念：一科學研究以改善人類的物質生活環境；二、實行民主政治以確保個人之價值。這兩個觀念在根本上卽是人本主義的，因爲「人爲萬物之度量」（Man-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於是人的活力乃得大量釋放出來。佛羅倫斯的人相信，凡事都要以人類合理的需求爲依歸，對人類無適應性與必要性的活動是沒有價值的。他們如此崇拜「人」，甚至要求建築也模倣人體的平衡有機結構。他們也相信人們有權力去自由運用智慧，而自由運用智慧乃是對人性的最高崇敬。

文藝復興時代出現了三位「英雄式的藝術家」（The Hero as Artist），卽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拉斐爾（Raphael），及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克氏推崇米開蘭基羅的大手筆，說他的「大衛雕像」就已經顯示他的英雄向度的藝術氣魄，而他滙集全力繪製的西斯汀天篷，則更是雄壯靈魂的偉大表徵了。克氏認爲米開蘭基羅的創作靈感，並非取自文學典籍，却源於自我的構思和獨創的頭腦。克氏最讚揚的還不是三巨匠的作品，而是他們的精神，特別是達芬奇探求知識的好奇心。凡事追根究底，總想尋求一個「爲何」（why）與「如何」（what）的答案。他的畫册裏記錄了他對宇宙萬物觀察的結論。爲了探知人體血脈的變化，他甚至於

從容等候一位百歲老人之死。如此對知識全面而狂熱追求的「好奇心」（curiosity），乃是文藝復興的主要精神。

㈣

近代基督文明的衰微，可說肇源於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固然，「宗教改革」對西方文明的發展注入了新血，因爲倘若沒有「宗教改革」的激盪，西歐文明可能如古埃及文明一樣，在長期安穩平靜中漸趨枯萎寂滅。但是克氏悲哀地追述說，「宗教改革」一旦猝然掀起，立卽變成盲目、無知與崇信暴力的羣衆運動，其後又演變成農民運動，其破壞力之巨大與普遍，連馬丁路德也悔不當初，深恐整個既存的社會體制可能完全覆滅。克氏舉該一時期的德國畫家兼雕刻家杜雷（Dürer）爲例說，在他的「先知性的憧憬中，我們看到文明可能爲來自內在的力量所毀滅。」在那個動亂的世代，雖然也出現人文主義的北歐代言人伊拉斯默士（Erasmus），以及明心見性的隱士如法國的蒙丹（Montaigne），但是精神世界從此是分裂了，傳統價值也崩潰了。

克氏引據名史家威爾斯（H.G. Wells）的史觀，做爲他進一步闡釋的註解。威爾斯曾提出「順從社團」（Communities of Obedience）與「意志社團」（Communities of Will）的區分見解，認爲順從社團產生像埃及和美索布達米亞的安定社會，是文明最原始的搖籃。而意志社團則產生動蕩不安的遊牧民族。克氏進一步貶抑宗教改革，認其基本上是一種意志社團的羣衆運動。而天主教會從自新中規復了權威與榮耀，間接地促成了西方文明的再生。其中幾個重要的轉機，包括了耶穌會成立，以及透過各種藝術形式復興聖母崇拜的傳統，因爲聖母的崇拜，代表和諧化，人性化與文明化。克氏指出，文藝復興時期的大藝術家都是虔誠的教徒，十分注重靈修的生活，服從教會的指示。因此卽證明了「服從」（obedience）也是調整鼓勵創造性的最佳原動力，並非如新教徒的歷史家的偏見，相信只有在叛逆反抗之下，才能創造文明。

㈤

十七世紀是一個「經驗之光」（The Light of Experience）的時代。法國的哲學家笛卡爾（Descartes），可說是這一時期的知性巨人。笛卡

爾爲了追求眞知，懷疑一切傳統的知識成果，從懷疑開始去重建知識的體系。同時英國也出現了知識上的大躍進。英國皇家學會成立了一個世界性的科學研究重鎭，其中包括了劃時代的科學家牛頓（Newton）。大詩人波普（Pope）說：「大自然與大自然的法則隱伏在黑暗裏。上帝說：讓牛頓出現，於是一切大放光明。」（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人們對於光的熱愛，擴展及於天空的羣星，格林威治天文臺滿足了這種渴求，而各式各樣的觀測儀器，乃應運而生。如此便形成了西方思想界，對感官經驗世界的强烈追求，與此相伴而生的是對精神價值的貶抑。强調感觀經驗，强調科學技術，工商文明成爲不可避免的後果，而其後遺症是混亂與貪婪，現代文明乃承受了毒害。克氏於此眞是慨乎言之了。

十八世紀是一個理性時代，也是一個所謂的啓蒙時代。當時歐洲人相信，人間一切問題，皆可用理智來解決，而理智可以改變人間爲天堂。伏爾泰是啓蒙的理性之士的代表。他敢於以清明的理性，對一切已存的事物，作重新的評估；他的理性所發掘到的結論，便是他熱切肯定的眞理。他無懼於任何迫害，建立了一個追求正義眞理的傳統。理性探索的狂潮也瀰漫到蘇格蘭，不僅亞當斯密寫了「國富論」，休姆寫了「人性論」，而且實用的天才科技家的集體努力，終使人類文明醞釀了一個巨變，那便是工業革命。

十九世紀則是一個「崇拜自然」(The Worship of Nature）的時代。根據克氏的看法，大約一千年之久，西方最大的靈泉一直是基督教。到了十八世紀初，基督教却突然衰微——在知識界消聲匿跡了，結果留下一片精神眞空。西方人不能適應來自外在的信仰，於是在以後的一百年內，他們自己醞釀了一種新信仰，這便是十九世紀的「崇拜自然」。一種近乎泛神主義的崇拜，認爲神創造了大自然，神居於大自然中，於是大自然有神性，是眞善美的最高結晶。從神學到自然哲學這個大轉變中，法國的盧梭（Rousseau）是先知先覺。他「我感，故我在」（I feel therefore I am.），正如笛卡爾「我思，故我存」（I think so I am.）之於經驗論思想，導發了人類情感上的一次大革命。從自然崇拜出發，盧梭居然

推演出一套嶄新的政治哲學，縷述於「民約論」中。「民約論」否定了天賦王權的觀念，强調平等、自由與公民的至上地位。這種石破天驚的新觀念，後來變成法國大革命的思想主流。以自然崇拜爲核心的浪漫主義，擴大而爲政治理想的人道主義，進而詰難一切既存的典章制度，視爲墮落迫害的人造架構，於是乃宣揚自由、平等、博愛，期望從全人類的基礎上，另建一個人間天堂，這便是法國大革命的理想。然而，這個偉大的理想一變而成羅伯斯比（Robespierre）導演下的大屠殺，二變而爲拿破崙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浪漫主義所孕育的文化理想和希望，乃幻滅有如南柯一夢。於是十九世紀歐洲人的精神出現了分裂的危機。一方面是工業革命所造成的中產階級，充滿希望和精力，却沒有價值觀念。傳統的貴族已告腐敗，新興的貧民在「優勝劣敗」的鐵律下，備受兇橫暴力的剝削和摧殘。藝術領域敏銳地反映了這一分裂的危機，無論是葛立考特（Géricault）、德拉克瓦（Delacroix）或羅丹（A. Rodin），都揭露了一個殘酷崩折的世界。

(六)

最後，克氏在「英雄式的物質主義」（Heroic Materialism）一章，正式點出了當代人類社會文化所面臨的嚴重困境和危機。十八世紀後期以來的西方人，一面陶醉在大自然，另一面則努改善自然環境，以求增進人類的福祉。這兩種動向是矛盾的，因爲後者的目的在征服大自然，前者則企圖與自然融合爲一體。人類的物質慾望畢竟遠高於美感，於是從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以來，培根（F. Bacon）叫出了「知識卽權力」，到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體現而成一個物質主義的大狂潮，人們對「物」的「迷戀」，變成一種心理執着；人間最高的聰明才智，幾乎全部傾注於對「物」的探討，征服與架構，於是物質主義具備當代英雄式的精神趨向，此一狂潮迄今還在躍昇之中。這是時代危機之一。

人是自私的，在哲理上，追求物質的利益，在於普澤衆生；但在實際演變上，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生產技術的創新，被相輔而生的資本主義所壟斷，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多數人愈顯貧困。這種貧富懸殊的現象，又爲一種殘酷的新學說所支持，卽所謂「達爾文主義」（Darwinism）的「物競天擇，優勝劣

敗」的自然哲學。殊不知進化論的法則，既然從歸納原始情況而得結論，只應說留置於原始時代，而不應推展或延伸於文明世界。這是時代危機之二。

在行動的世界中，現代文明最明顯一點是我們對機器的依賴，與日俱增。機械已經不再是被利用的工具了，反而開始指引我們。從重機鎗到計算機，各種機器均可被野心家和獨裁者利用來控制人民，迫害人民。更嚴重的是，人類自我毀滅的衝動。人利用機械在兩次慘絕人寰的大戰中，大量毀滅自己，同時坐令邪惡氾濫於世界。邪惡像叛逆的天使，存在於我們周遭，深潛於我們的內心。人類必須自我拯救了。這是時代危機之三。

儘管困境嚴重，危機重重，克氏還是對人類文明的前途抱持樂觀的，悲憫的展望。他不相信我們正在進入另一個野蠻時代，因爲孤立、絕望、缺乏流動性和好奇心等，那些黑暗時代的困素，今天並不存在。他誠懇敦勸滿懷希望的年青人，不要恣意憎惡，甚至毀棄現行的制度及成規，因爲縱使在最黑暗的時代，制度規章仍是使整個社會運行的綱紀。二十世紀承受了文藝復興以來就已發動的文明衝力，歷經了啓蒙的理性時代，美國與法國的大革命、工業革命，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兩次世界大戰，乃至今日的核子競爭，這是一個空前的大動亂，大矛盾，也是大希望的時代。在這個風狂雨暴的變動時代裏，我們彷彿迫切需要一些不變的原則和信仰。因爲誠如克氏充滿智慧而語重心長的結論，筆者也服膺並相信下列一段話是人道的眞理：

「秩序比混亂好，創造比毀滅好。寧可要溫和而不要暴力，寧可要互相諒解而不要互相仇殺。知識勝於無知，人類的同情心比思想體系更有價值。雖然近代科學創造了偉大成就，人在過去兩千年來並沒有多大改變，因此必需從歷史中汲取教訓，而歷史就是我們自己。」

（本文暫分上、中、下三篇，陸續刊出。本篇僅就克氏「文明」一書要旨簡約介紹，結論中筆者將綜合三家之史觀，略予評述。又本文摘錄自顏元叔教授之譯本：「開天闢地——西洋文明的變遷」特多，併此聲明並誌謝。）